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新史（外两种）

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葡]安文思 [意]利类思 [荷]许理和 著
[中]何高济 译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中国新史（外两种）

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葡]安文思 [意]利类思 [荷]许理和
[中]何高济 译 著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史：外两种 / (葡)安文思, (意)利类思,
(荷)许理和著；何高济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6. 9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347-8313-5

I. ①中… II. ①安… ②利… ③许… ④何…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前期 IV. ①K249.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9402 号

中国新史(外两种)

[葡]安文思 [意]利类思 [荷]许理和 著
[中]何高济 译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耿晓渝

责任校对 裴红燕

封面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5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Politick Government, Town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c.

Newly Done out of French.

London
Printed for Samuel Holford, at the Crown
in the Pall Mall, 1689.

《中国新史》英文版封面



安文思墓碑



王府井天主教堂（即东堂，又名圣若瑟堂）

目 录

中国新史	[葡]安文思 著	1
中文版序言		3
中译序		7
致崇高的红衣主教德斯特列阁下，法国公爵和贵族		10
法文版序言		12
第一章 中国人和外国人给中国取的名字及契丹和蛮子国		19
第二章 中国的广度和分界：城市和有墙垣的村镇数目 及其他中国作者提到的特点		34
第三章 中国的古代及中国人对此的高见		49
第四章 中国的文字和语言		54
第五章 中国人的智慧和他们的主要典籍		64
第六章 中国人的礼节、典仪和节日		71
第七章 中国人的土木工程和建筑，特别是大运河		76
第八章 非凡勤勉的民族		80
第九章 中国人的船舶		84
第十章 中国物产的丰富		87
第十一章 中国的贵族		92
第十二章 国家良好的政体、曼达林的差异以及朝廷的各部门		94
第十三章 文官六部、武将五部		98
第十四章 北京的其他几个部		106
第十五章 省的几个衙门和曼达林		116
第十六章 中国的大帝王及其赋入		121
第十七章 记北京城：皇宫四周的墙及中国主要房屋的形状		128

第十八章 皇城的二十座宫殿.....	136
第十九章 皇城内的二十座特殊的宫殿.....	147
第二十章 同一范围内另外几座宫殿和庙宇.....	153
第二十一章 北京的皇家庙宇及皇帝外出进行公祭的方式.....	161
安文思神父传略	[意]利类思 著 167
在黄虎穴中——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张献忠朝廷 (1644—1647)	
..... [荷]许理和 著 175	
导 言.....	177
张献忠 (1606—1647)	178
利类思和安文思.....	180
耶稣会史料.....	186
灭种的观念.....	188
张献忠和基督教.....	193
张和欧洲天文学.....	195
后 记.....	197
参考书目.....	198
附录 利类思、安文思传	何高济 201

中国新史

[葡]安文思 著

中文版序言

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葡萄牙入华传教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史》，是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与此前在西方出版的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1615），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鞑靼战纪》（1654）、《中国新图》（1655）和《中国上古史》（1658）一起构成了西方17世纪关于中国知识的最重要来源。国内学者计翔翔认为这部著作是西方早期汉学第一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和第二发展阶段的起点，甚至认为它已经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①

从汉学的角度来看，他对中国的介绍更为系统和全面。从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风俗到中国的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及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安文思一一作了介绍，给西方人呈现出了一幅中国的全景式图画。安文思写这本书时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由于他本人认同利玛窦的“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他对中国的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书原名为《中国的十二特点》，实际讲的是中国的十二条优点，即：

1. 中国版图广大（第二章）；
2. 中国历史悠久（第三章及第一章、第五章的部分内容）；
3. 中国语言文字优美（第四章）；
4. 中国典籍丰富（第五章）；
5. 中国人有礼貌有教养（第六章）；
6. 中国水运便捷，公共工程完善（第七章和第九章）；
7. 中国工艺制造精美（第八章）；

^①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页。参阅计翔翔《耶稣会士汉学家安文思及其〈中国新志〉》，《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笔者认为西方汉学的发展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在我看来仍处在“传教士汉学”阶段，尽管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8. 中国物产丰富(第十章)；
9. 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第十一章)；
10. 中国政治发达(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
11. 中国君主之伟大(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一章)；
12. 北京城之宏伟(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①

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该书对北京的介绍最为详细，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他不仅介绍了王府井、白塔寺、铁狮子胡同、鲜鱼口等地点，还详细介绍了皇城，包括皇城的大小、皇城中的二十座宫殿等。如果不是经常在皇宫中活动，绝不可能对它做如此详细的描写。正因为安文思长期生活在北京，他的这些报道和描写不仅推动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了解和认识清代历史的细节和材料，这些在今天依然很有价值的。

比如，在谈到皇宫每年的赋入时，他给我们提供了下面这些数据：

1. 每年运进宫廷粮仓的米、面达四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袋；
2. 一千零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七个盐块，每块重五十磅；
3. 两百五十八磅极细的朱砂；
4. 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七磅漆……

安文思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清朝宫廷经济生活的参考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能较为真实地感受到当年清朝宫廷生活的实际状况。

在谈到皇帝祭祀的仪仗队伍时，安文思的记述也十分详细。他写道：“他的仪仗如下：首先，有二十四名执大鼓的人，分为两行，每行各十二人。下面的行列也是如此。其次，二十四名喇叭手，每行十二名。……第二十三，两千名文曼达林，一千名一队。第二十四，两千名武曼达林，全都穿着华丽的礼袍……”这些文字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我们对清代皇帝祭祀的仪仗队有了更为直观、具体的了解。

安文思的书还提供给我们许多珍贵的清史材料，将这些材料和中文文献相互印证，能补充中文文献的不足，加深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

安文思在书中说，1669年12月8日，皇帝命三位官员到汤若望的墓地

^① 计翔翔：《耶稣会士汉学家安文思及其〈中国新志〉》。

焚香，“其目的是向他作特殊的礼敬；又命令赐给当时在朝的三个神父（我是其中之一）三百二十五克朗，支付他丧葬的费用”。此事《正教奉褒》中有载：“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上遣礼部大员，捧御祭文一道，至汤若望墓所致祭。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供设香案跪迎，恭听宣读。其文曰：‘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安文思说，第二天康熙在宫中宴请大臣时，让他们三人也参加了宴会，他们坐在右面第三排的第一张桌。这点《正教奉褒》没有记载。

杨光先案是清初的大事，本书中也有记载，安文思说杨光先“加给汤若望神父的一条大罪是，在制作天体仪时，神父没有标出北极星，中国人称之为帝星，即众星的帝王星。因为它不移动，他们说众星都围绕着它，有如臣民围绕着皇帝，为他服役。所以他们认为，皇帝在地上和那颗星在天上一样。这个骗子由此得出结论，说汤若望神父没有标出这颗星，是因为他不承认中国皇帝，因此他是叛逆者，该当死罪”。另，《正教奉褒》中有载：“康熙四年三月初一，礼刑两部会议，拟汤若望处死，其余教士俱杖充。初二日，辅政大臣方欲依议批行。忽地大震，惊散未批。”不少人认为这是教内的记载，不足以信。但安文思的书中也记载了这次地震，他是当事人，当时生活在北京，这使我们对这个事实有了新的旁证。

书后所附的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神父传略》也是一份重要的文献，传记中记载了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处的经历并补充了有关张献忠的文献。^①书中写安文思死后，康熙赐给他悼词，这一点现在可以在中文文献中得到印证。^②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的第十二卷中收有利类思和南怀仁所写的《远西景明安先生行述》的中文文献，此文和《安文思传》完全对应，从而证实《中国新史》的真实性。

^① 参阅《圣教入川记》。

^② Albert Chan, S. 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p.453; 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530页。

现在这个译本以1689年英文本为底本，个别篇章译自法文本，同时译者也核对了1957年版葡文本。虽然英文版和第一版的法文版相比有了不少改动^①，但英文版有一个优点很值得称道，即在许多章的后面加了注释和说明，将安文思所记的事实和此前在欧洲出版的其他汉学著作进行比较核对，这实际上是把安文思的书放到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评价，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人在16—17世纪对中国认识的变迁。

张西平

2016年6月

^①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中译序

加伯利埃·德·麦哲伦（Gabriel de Magalhães），汉名安文思，字景明，葡萄牙人，系大航海家麦哲伦同族。17岁入耶稣会，1634年申请赴印度传教，抵达果阿，在修道院讲授修辞学。两年后赴澳门。1640年随一位信教官员进入中国，到达杭州。因利类思神父在四川传教期间害病，需人协助，安文思遂获允前往，于1642年8月28日抵达成都，与利类思共同从事传教事业。张献忠入川，据成都，二人随百姓逃往山中。张得知其信息，命人求得，赐以馆舍居住，并命他们制造天文仪器。但张喜怒无常，凶狠残暴，二人欲离去，为张所拘，准备就刑，旋清兵前锋至，张前往侦察，被清兵射死，两神父亦为清军俘获，由肃亲王豪格送往京师。从此两神父为清廷服务，受顺治优遇，赐予住宅，两神父在此基础上修建一座教堂，即现今位于王府井大街之东堂。经历1662年教案，安文思于1677年5月6日逝于北京，葬阜成门外。利类思撰有《安文思神父传略》，概述其生平。

安文思自1648年到北京，一住二十九年，可以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1688年安文思用葡文写成一部记述中国的书，取名为《中国的十二特点》，未刊印。值中国教团总监柏应理神父至罗马，晋见红衣主教德斯特列，主教询问有关中国特别是北京的情况，柏应理神父遂将携带的手抄本《中国的十二特点》交给主教阅读，主教交伯农译为法文。原葡文手稿似未能保留，今所见最早的法文本刊于巴黎，题名《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该本除将原文分章外，还根据其他同时代的材料，如汤若望、南怀仁和卫匡国的信札、著述等，对文本加以注释。1689年有人自法文译为英文，刊于伦敦，题名《中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其中包括对政治体制、城镇和百姓风俗习惯的记述。1957年在澳门出版一个自法文译出的新葡文本《中国新志》（*Nova Relação da China*），其中又对一些名词略加中文注释。

本书是西方早期汉学名著，其价值和优点正如伯农在本书法文版序言中所述：“这部书具有重大意义，可满足那些想了解那个遥远国度的人

的好奇心，因为它如实地、一步又一步地描述了著名中华帝国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安文思对皇城中轴线及两侧的皇宫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同时，还将许多宫殿名称译为葡文。安氏曾在司天监任职，有权自由进出皇城，能够看到并参观皇宫，所述当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为研究明清之际的皇城的变化提供了不少资料。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仅安文思和利类思曾近距离接触到农民军领袖并作出报道。利类思的《安文思神父传略》已概述了他们在张献忠大西朝的经历。安文思写给耶稣会的报告《有关四川省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丧失及利类思、安文思神父俘囚经历的叙述》更多地记述了张献忠及其军队在四川的活动，其中几桩事件记录真实，可与中文史料相印证。

在论中国土地的一章中，安文思说，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派义子孙可望去攻打一个不肯归顺的土王，孙采用持重和怀柔的策略使土王投诚，然后陪同他到宫廷去，张举行盛大宴会接待他。但在乐声、喜剧和欢乐声中，张命人把毒药放进酒杯中，将他毒死，随行的四万人也被张的军队包围歼灭。关于这桩背信弃义的屠杀，《明季南略·张献忠乱蜀本末》有相同的记载：“献忠命张（孙）可望率兵攻乐用寨罗从义……乐用寨有山最高，名红崖囤，上可屯万人，险峻不可攻，罗从义率五千精兵札其上。可望兵至，围数月不能下，乃遣人往说之，从义举众降，可望诱至成都，尽坑之。”可见张献忠之奸诈残忍。

安文思的报告中还谈到另一件事：张献忠出门前，把士兵都召到校场上并发表讲话，称为减轻负担，他已把满载金银的六十艘船沉入江中，而且确实沉了船，并杀死船夫，隐瞒沉船地点。此事有《纪事略》的记载为证：“献忠传抚南将军张文秀领大船二百余号，俱装载金银，为数不赀，命顺流放下，至川南青神县江口，沉于江内，将船只纵火焚烧，驾船贼兵，尽杀以缄其口。此银后为杨锦江打捞，获银八百余万两。”虽船只数目不尽相同，但沉船杀人灭口之事则确有之。

最有意思的是，安文思特别提到张献忠送他和利类思每人一首他亲笔写在黄纸上的诗，给利类思的一首，用葡语拼写的汉语读音如下：
 T' iēn yeù uán wo yú gîn / gîn uû yí uo yû t' iēn / guêi xin mâm mâm / iû sû, iû liám。
 这和四川现存张献忠圣谕碑的文字“圣谕：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自思自量”完全相同。最后一句“iû sû, iû liám”正是“自思自量”的译音。全诗意思是清楚的：人对天犯下罪行，鬼神明白，

我们当认真思考，也就是当替天行道，实行天诛。所以后人度其意，加上七个“杀”字，便成了著名的七杀碑。张的这套手法还真管用，据《明季南略》载：“（张）或时向天自语曰：‘天教我杀，我敢不杀？’于是左右愚人皆信以为天使杀戮，不敢背叛。”

现在的这个中译本《中国新史》系译自英文本，译名参考了新葡文本。其中“致崇高的红衣主教德斯特列阁下，法国公爵和贵族”这封书信系自法文本译出，英文本未收；法译者加的注释，亦在文后作为正文译出；页下注为中译者加；英文版附利类思《安文思神父传略》亦一并译出。

又，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撰有《在黄虎穴中》一文，论述利类思和安文思两神父在张献忠朝廷的见闻，以二神父的著述为原始材料加以引用，现将此文一并译出。

何高济

2016年7月